

印三姐妹跳井 嫁妆暴力多可怕

最近,印度又发生了一起和嫁妆有关的惨案。一家三姐妹,带着两个幼儿,以及腹中两胎儿,跳井自杀。

“一案七命”,震惊世人。

“我们不想死,但死亡总比被虐待好。我们的婆家是我们死亡的原因。”

在聊天软件上给亲人留下这条信息后,米纳三姐妹——卡鲁·米纳、卡姆莱什·米纳、玛姆塔·米纳——失踪了。

几天后,三人被发现死在印度郊外的一口井中。

更令人震惊的是,死者不止她们仨,还有卡鲁的两个孩子,一个只有4岁,一个尚在襁褓。另外,卡姆莱什和玛姆塔还都怀着身孕。



三姐妹之死

印度有句俗语:一家若有三个女儿,全部家产都败光。

按当地传统,女方父母不仅要在婚礼时送出高额嫁妆,婚后还得一直给女婿家“送礼物”。不然,女孩到了婆家,很可能遭受来自丈夫和公婆的虐待。

米纳三姐妹便是如此。

在嫁来自同一个家庭的三兄弟后,她们一直备受折磨。

噩耗传来时,三姐妹的父亲老米纳悲痛又自责。他说,女婿们一直逼他的女儿从娘家要更多的钱,但他拿不出来。

“实际上,我们已经给了男方很多嫁妆,包括床、电视、冰箱等,你可以在他们的家里看到。”

老米纳是一名农民,收入微薄,且有6个女儿。他坦言:“我能给她们的确实很有限。”

尽管米纳三姐妹觉得“像生活在地狱一般”,她们娘家人也早知道男方家庭的暴力行为,但没有人将离婚作为一种选择。

在印度,离婚如今仍被普遍视为禁忌。

“一旦女儿们结婚,我们认为她们应该留在自己的婚姻家庭中,以维护家庭的尊严。”老米纳说,“如果我们让她们再婚,情况将变得更糟,我们会丢脸的。”

最终,走投无路的三姐妹带着孩子集体自杀。

目前,警方以“滥要嫁妆”“虐待配偶”的罪名逮捕了三姐妹的丈夫、婆婆等男方亲属。

米纳三姐妹之死,再次将“嫁妆暴力”推到聚光灯下。

这是印度社会的痼疾。2020年,印度国家犯罪档案局记录了近7000起与嫁妆有关的杀人案,平均每天约有19名女性被杀。

这个数字是从警方提交的报告统计得来,实际数量或许还要高得多。

梅拉就是一个没有被官方数据统计在内的“嫁妆暴力”受害者。

类似的谋杀案不在少数。

丈夫强迫妻子穿上易燃的尼龙纱丽,往其身上浇上汽油或石蜡油,然后点火。一旦妻子死了,丈夫便宣称是其做饭时不小心着了火,躲避法律制裁。

而比谋杀更隐晦、更常见的手段,是“软刀子”逼人自杀。

情感折磨、扣留钱财、家庭暴力、赶出家门……为了谋求更多嫁妆,一些男方家庭无所不用其极。

比如,去年轰动印度的“维斯玛雅案”。

维斯玛雅是个家境不错的漂亮姑娘。2020年,23岁的她通过相亲,认识了与自己十分投契的库马尔,不久后开心地嫁给了对方。

然而短短一年后,她就在浴室上吊自杀了。

“她是被迫结束自己的生命。”维斯玛雅的亲属说,库马尔一直因为嫁妆的事找茬儿,甚至对女方施暴。

维斯玛雅曾给娘家同龄亲属发信息:“他一生气就打我,还一直辱骂我父亲。实在难以忍受时,我就想走出房间,但他拦住我,拉着我的头发,扇了我一巴掌。我摔倒在地,他把脚放在我的脸上。”

“如果一个女人,因为她的婚姻生活似乎走到了尽头而不得不自杀,我觉得印度政府是失败的。”印度活动家卡维塔·斯里瓦斯塔瓦说。

不只影响贫穷女性

印度的“嫁妆暴力”几乎发生在所有社会阶层中。

2007年,时任印度人力资源发展部部长阿琼·辛格和家人被告上法庭,遭孙媳妇一家指控过度索取嫁妆。结婚时,女方家已经花了12.5万美元;结婚后,男方家又提出要豪华轿车和首都房产,不给就家暴。

2013年,印度前世界小姐冠军尤塔·穆赫赫报警,指控丈夫因嫁妆问题,长期对她进行精神和身体的双重虐待。

“嫁妆暴力”对女性的身心伤害不言而喻。

曾研究印度嫁妆制度的法学学者赵彩凤告诉记者,19世纪以来,印度人堕女胎、溺杀女婴现象与此有关。而活下来的印度女孩,自小便有愁嫁的焦虑,在原生家庭地位低;婚后又遭遇丈夫家庭各种暴力,直至被害。

那么,高额嫁妆对男性就是百分百有利的吗?

也不是。

由于负担不起嫁妆,印度一些贫困家庭开始铤而走险,给女儿“抢”个新郎回家。

维诺德就是受害者。他参加朋友的婚礼时,有人找他攀谈,还主动提出婚宴后可以捎他一程。结果对方把他带回了自家,还拿枪指着他的头,逼他换上新郎礼服。

“那人殴打我,威胁我说,如果不娶他妹妹就是死路一条。”

维诺德哭着求他们放了自己,一旁的女方亲戚却无动于衷,还说:“我们是在给你办婚礼,又不是送你上绞刑架。”

之后,维诺德的家人也接到恐吓电话,要求他们家必须接受新娘。他们立刻报了警,但一个多月过去也没得到任何回复。后来,连警察都开始“和稀泥”,劝他既然已经结了婚,就好好跟妻子过日子。

这导致在印度一些地区,适龄未婚男子一度不敢在晚上单独外出。

赵彩凤认为,高额嫁妆导致男子同样成为婚姻市场的“商品”,被待价而沽,且婚配资源在不同种姓、阶层的

男子间分配不均衡。

“受嫁妆主导的结合,就像天价彩礼婚姻一样,使人很难有能力享受以爱情为基础的现代伴侣式婚姻幸福。另外,男子都有生女孩的几率,生了女儿之后,也可能会沦于嫁妆压力的循环之下。”

法律管不了?

其实早在1961年,印度便颁布了《嫁妆禁止法》,并在1984年和1986年对该法进行了两次修订。该法规定,凡是接受和索取嫁妆的行为皆属犯罪。

但60多年过去了,高额嫁妆以及因此导致的暴力犯罪依旧广泛存在。

据不完全统计,在印度,女方嫁妆费用约为男方彩礼费用的7倍,约为女方家庭6年的收入总和。

何以至此?

作为受害者亲属,维斯玛雅的哥哥说:“在当地,嫁妆必须相当可观,因为一个家庭的地位取决于它。社会地位很重要。”

还有一些低种姓家庭,为了改变社会地位,争抢着让女儿与高种姓家庭结亲。在这种风气下,高种姓男子成了“紧俏货”,开始坐地起价,不断抬高对嫁妆数额的要求。

“印度现代嫁妆引发的暴力等问题不是一蹴而就的,其原因错综复杂。”

据赵彩凤介绍,目前印度本土和西方学界对此主要有两大派观点:一是文化论,归咎于印度本土根源;二是殖民论,归咎于英国殖民,因为印度的传统嫁妆曾有历史相对合理性。

在她看来,该现象是多元因素综合作用所致,印度特定的宗教文化与种姓制度、西方殖民导致社会结构等变化、资本全球化对生活世界的“殖民”等,都是不可分割的关键因素。

至于法律为何迟迟不起作用,赵彩凤表示,世界上被动进入法律现代化的文明,大都经历了法律制度与法律文化冲突磨合的过程。

“印度法系有其强大的宗教法特质,该特质可能对法律文化格外起到了加固作用。这一方面有其积极的历史意义,使其保持了鲜明的民族或族群文化特色;但另一面,可能如法学家梅因所说,法律与宗教如果在历史上没有及时松绑,会导致后来的‘不幸’,阻滞社会生活和民众见解的前进。”

“应该看到,尽管‘嫁妆暴力’事件仍频繁发生,但印度的法律现代化改革已在缓慢起作用。”赵彩凤说,一些研究表明,印度种姓文化在淡化,嫁妆制度在渐趋衰落。

但目前,嫁妆仍是印度人不能承受之重。

在这样的嫁妆制度下,没有“赢家”,只有擦不尽的血泪。

本报综合消息

从事着条件差、报酬低、风险大的工作,不仅生命安全无法保障,身心健康更受到严重威胁……这是绝大多数童工生存的真实写照。

目前世界上仍有1.6亿名童工,几乎占全球儿童总数的十分之一。

来自国际劳工组织的警告称,童工人数还可能上升,新冠疫情或使全球多年来消除童工的进展发生逆转。

全球童工人数反弹

2002年6月召开的第90届国际劳工大会上,决定将每年的6月12日定为世界无童工日。今年的主题是“普及社会保障,消除童工现象”。

20年来,全世界在减少童工方面取得不小进展。

来自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显示,从2000年到2020年,童工数量减少了8550万,占儿童总数的比例从16%下降到9.6%。

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,这一进程开始有所放缓,在2016年至2020年间甚至停滞不前。

2021年,全球童工人数出现20年来首次反弹,升至1.6亿。特别是5岁至11岁年龄组中,童工人数增加显著。

目前,非洲在童工发生率和童工数量方面都居第一,有五分之一的儿童为童工,绝对数量达到7200万人;亚洲及太平洋地区位列第二,童工发生率为7%,绝对数量达到6200万人。

其余的童工主要分布在美洲(1100万)、欧洲和中亚(600万)以及阿拉伯国家(100万)。从童工发生率来看,美洲为5%,欧洲及中亚为4.1%,阿拉伯国家为3%。

目前世界上仍有1.6亿名童工

统计显示,农业生产中的童工最多,占70%(1.12亿),其次是服务业(3140万)和工业(1650万),分别占20%和10%;此外,童工现象在男孩中比女孩中更为普遍;农村地区的童工现象(14%)比城市地区(5%)高出近3倍。

疫情导致童工人数增加

当地时间5月15日至20日,第五届全球消除童工劳动会议在南非德班举行。

这是全球消除童工大会首次在非洲举行。会议通过了2025年全球消除童工的“德班行动”宣言,呼吁各国努力推动人人享有体面工作、消除农业童工现象、消除和防止雇用童工、维护儿童受教育权、对童工采取普遍的社会保护以及增加融资和国际合作。

多年来,国际社会为解决童工问题做出了大量努力。

1973年,国际劳工组织通过《最低就业年龄公约》(第138号公约),规定就业者的最低年龄为15岁(特殊情况除外)。

2020年8月5日,国际劳工组织发布公报,宣布该组织187个成员全部批准了《消除最恶劣形式童工劳动公约》(第182号公约)。一项国际劳工标准得到所有成员的批准,这在国际劳工组织历史上还是第一次。

统计显示,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发生率在2000年至2016年期间下降了近40%。

不过,2021年,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全球童工人数20年来首次增加。

国际劳工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去年发布报告称,由于新冠疫情流行,到2022年底,全球将有900万儿童面临成为童工的风险。

对此,国际劳工组织表示,社会保障既是一项人权,也是有利的政策工具,防止家庭在危机时期使用童工。

截至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之前,全球仅有46.9%的人口享有至少一项有效的社会保障福利,而其余的53.1%,即多达41亿人却完全得不到任何保障。

儿童的社会保障覆盖率甚至更低。全球有近四分之三的儿童,即15亿人缺乏社会保障。

哪些国家童工数量占比高

尽管低收入国家的童工发生率最高,但实际上,中等收入国家的童工数量并不少。有数据显示,8400万童工生活在中等收入国家,占总数的56%。另外,还有200万童工生活在高收入国家。

在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美国,童工现象就令人触目惊心。

与奴隶贸易、种族歧视一样,美国的童工问题由来已久。100多年前,美国矿井、烟草农场、纺织工厂就开始雇佣压榨童工。历史上,美国童工年龄最小的甚至只有3岁。

时至今日,童工问题依然在美国泛滥。美国是全球唯一没有批准《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》的国家。

据统计,美国目前仍有约50万童工从事农业劳作,其中烟草行业雇佣童工极为普遍。美国政府问责局的统计数据显示,2003年至2016年间,美国共有452名童工死亡,其中237人来自农场,占比超过一半。

“美国童工的悲惨遭遇只是美国系统性侵犯人权问题的冰山一角。”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6月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提问时表示,尊重和保护儿童权利、使他们免于从事繁重劳动是各国共识。但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,美国却屡次因严重的童工问题受到国际劳工组织点名批评。

消除童工的工作是“对一代人的投资”。此前,国际劳工组织的一项统计表明,尽管投入不小,但消除童工现象后产生的经济效益,或比成本高近7倍。

正如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盖伊·赖德所说,“毫无疑问,童工是对基本人权的侵犯,我们的目标必须是让世界各地的每个儿童都免受童工之害。”

本报综合消息